

# 远去的夕阳山外山

文/王 馨

2016年6月的一个清晨,方英文先生照例在朋友圈晒书法。我刚一点赞,他便私信说他结束了一项大工程:刚刚把一部毛笔写成的长篇小说敲打成了电子版。我当即表示祝贺。他说机缘巧合,你该是这部作品的第一个读者,发你给我审一下如何?我说荣幸啊,心想这“第一个读者”,使命重大呢。

于是我两天时间趴在电脑前,读完了这部名为《群山绝响》的长篇。这是我第一次看电子版小说,很伤眼睛。

离开校园后我很少读小说。当代小说读得少,长篇能读完的更少。农村题材的小说,即便非常知名,也多半没读完。因为印象里的农村题材小说,较多写苦难,写愚昧落后,满是怨愤与挣扎。可能与农村题材的作家大多出生于最贫困、最底层有关,导致他们无法客观平静地看待一切;回望故土时,很难超越自身成长的局限。

没有美的记忆,怎能写出美的作品!

苦难和抗争一直是农村题材的根本主题。然而仅仅凸显和渲染苦难,对于一个延续几千年的农业社会来说,难免有些片面和单薄吧。乡村文明在哪里?文明的基础是什么?即使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样异常的岁月里,《群山绝响》告诉我,文明依然根深蒂固地存在于广阔的乡村世界。

我写了几条阅读笔记,打算形成文字。可是方英文说不值得,能否顺利出版还两说呢。也就放下了。所幸两年后出版了,作家首先签名寄赠我这“第一个读者”(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2月版)。于是我又认真读了第二遍。

一本写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的小说,居然让我一读再读,除了作品本身的魅力,还另有缘由。多年前我开始发表一点小散文时,一次与方英文在同一家报纸副刊上亮相,文章紧挨着!爱屋及乌,顺带读了他的那篇文章,十分有趣!后来特意网购了他的书仔细拜读。

一读之下,感觉他的书写得很顺畅,温润雅致,谐谑有度,智者的自嘲兼容贤者的善良,语言风格自成一家,可简称为“方氏幽默”。

《群山绝响》延续了方氏文笔的挥洒自如、从容不迫,也延续了表达方式上的幽默和克制。他对于环境和人物之体会,是相当细微、敏感和含情脉脉的,有一种陕南山水赋予的阴柔之美。

方英文同样承受过乡村文化、物质两匮乏之痛。但他出生于典型的耕读人家,属于“士阶层”,受过相对完整的家风熏陶。家庭给了他难得的保护,他所承受的痛与苦,还不是最底层农民所承受的那种极致的痛与苦。于是他能从小被启发出对于生存环境的美的感悟力,始能含着淡淡的忧伤、淡淡的欢喜、淡淡的温情,绘出一幅业已遥远的乡村图画。

《群山绝响》中的陕南农村,有它美的一面。农民,除了愚昧、自私与怯懦,还有淳朴、良善与古雅。作家笔下,我们可以感受到仁义礼智信之“礼”,既保存在乡村,也传承在乡村。无论环境多么艰难,无论身份多么卑微,甚至于目不识丁,但是人们的血脉中,依然流淌不息着“礼”,不会忘记该有的“礼”,始终视“礼”为“活人”(生存)的根本。

来而不往非礼也,这条老规矩在元尚婴母子及乡人身上尤为突出。比如为了在上高中的推荐表上盖章,元尚婴给马会计送礼,马会计心有戚戚,当场决定回赠一块砧板。元尚婴当然不能要,但

马会计想了各种办法,硬是让元尚婴无话可说、自然而然地接受了砧板。这块砧板在树被砍光的年代是很稀罕的,价值远远超过元尚婴送来的四两肉票、五颗鸡蛋,外加一包花椒;但是即使吃亏,马会计也必须“回礼”!母亲在收到砧板后,觉得本来是求人的,反倒赚人家一笔,导致全家人抱愧不已。

看到这一段时,眼前出现了影视剧经典的场景:两位身着长袍的中国人正在面对面互相施礼,你鞠一躬,我鞠一躬,你赶紧再鞠一躬……

这种非常善良非常有人情味的品质,刻画了那个时代农民的本质。说是自私且爱占小便宜,却同时又往往不愿让别人吃亏,总是念及人家的好处,以备随时“回礼”弥补,只有如此心理才会安生。这是一种做人的底线。

所以,即便是委屈心性,即便是人在屋檐下,书中的人物也可以释然,也只有感恩,而不是仇恨。

这需要广阔的心胸,和对世故人情明了释然的智慧。

这是一个有着良好家风家教和传统文化积淀的人才有的视角,才能有这种细致入微的体验,也才能从这样一个角度,怀着一颗唯美的,文明来回忆并描述这一切。

方英文怀着感恩、追忆、理智面对的心态,以温情的怀恋和微泪的伤感,选取一位中国最基层的乡村家庭出身的主人公的视角,也只有这样一个身份的少年,才可能有的纯净善良的眼睛,来观察和思考,并展开一幅温情脉脉的乡村画卷。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乡村,中国最底层的农民阶级在极度贫乏的物质条件下谨慎地呵护着农耕社会的传统道德,默默地恪守着仁义礼智信的做人信念。

这是以血缘姓氏连结、以传统道德维系的中国农村的最后的背影。

1976年后的中国农村,迎来的是翻天覆地的巨变,现代文明,现代工业以及城镇化建设快速覆盖了中国大地古老的传统的乡村。农民在解决了温饱的同时,中国传统的乡村从形式到内容都走向了没落。

《群山绝响》,为我们演奏了一曲深情唯美的乡村挽歌。

《群山绝响》,方英文著,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人生只在书文里出彩

## ——读杨振喜先生新著有感

文/丁肃清

把杨振喜先生称为看文老眼当之无愧,他在文坛评论界持锄耕耘、撰文著述几十年,近又有新著出版,《孙犁散论》《文论末编集》。谈杨振喜的文艺评论,当首谈孙犁,为什么这么说?纵观他的文艺评论之成就,是有点有面,这一“点”就是他对孙犁的研究,而那个“面”则是他对众多作家作品的研究了。新出版的《孙犁散论》,是他写孙犁的第二部论著了。

就河北文学而言,孙犁无疑代表着一个时代,孙犁不是个独行侠,时代的精神和风貌,时代的作家和作品,都或多或少与他牵连着。杨振喜研究孙犁,也是研究了一个时期的河北文学。他对孙犁的研究是系统的、全方位的、长时期的。

《孙犁散论》收录有33篇文章,有的是作者在纪念孙犁活动上的发言、答记者问,大部分则是他发表的评文。相比较他之前评孙犁的文章,其选材、选题更随意性,只言片语、竹头木屑,凡是与孙犁有关的,他都拿来进行艺术欣赏、思想分析。这样一来,孙犁在读者们面前就更加生动、光彩照人了。

就《孙犁散论》评论语言风格而论,则是信马由缰的那种,不格式化,也不是板着脸说,这样的评论语言是自由王国的气质,是在山顶看山的那种俯瞰姿态。读杨先生的语言,就像是他坐在你的对面与你侃侃而谈,风生水起有了,手到擒来有了,亲和力也有了,评论效果出来了。

当年的《文论报》文界皆知,那是诠释中国文学现象与走向的纸媒,作家们都曾对此仰视有尊,杨振喜是其主编,与其他报刊一样,主编者那是一定有真本事的,特别是评论刊物的主编,当年的《文论报》曾推出了许多作家,人们有目共睹。杨振喜的评论就是杨振喜的评论,套路独具。看他一篇文章的开头吧,《论小满儿》是这么开头的:“小满儿,作为一个特殊的艺术形象,是孙犁人物画廊里的出色创造。正是这一独特创造,把我国当代小说美学推向一个崭新阶段。”有心人会发现,短短几个字,开门见山就点出了四个要素,“艺术形象”“孙犁”“独特创造”“当代小说美学”,开头字数少但容量大,下面的正文就顺势推舟了。

“孙犁先生走过了他的五十年文学历程,他奉献给人类的是一个常在的隽永的艺术世界。”这是杨振喜另一篇文章的开头,他说孙犁的艺术世界是“奉献给人类的”,这即是杨振喜对孙犁的评价。对孙犁作品的研究,他用了几十年的时间,可以说是面面俱到了。作为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荷花淀派”的代表人物,孙犁对中国文学是有重大贡献的,而杨振喜坚持不懈地研究孙犁,无疑也是对中国文学的贡献。研究孙犁,不仅仅是对其文学作品本身,还有其艺术文脉、文学影响、文学地位、后来者之传承诸多方面。

艺术视野是决定艺术家们水准的要义。纵观杨振喜的《孙犁散论》,他是把孙犁文学放在了地方历史文化、人文风貌、中国文学现象大局中操盘的。他的文稿里多次提到文学的这派那派,从汉魏两晋说起,说遍了古今小说文体,一直说到诸如“寻根文学”“新乡土小说”“新人文小说”等等,然后把孙犁放在这些格局里去发现孙犁。

在此摘录杨先生新书后记几句:“从1987年秋天,我把《孙犁评传》交于百花文艺出版社1990年1月出版,迄今三十多个春秋。关于孙犁研究,堂皇地说,也算研习有年吧。成绩如何,不去评说。”然而杨先生又十分谦虚,称之为“作文以记,留给自己,或和我一样爱着先生的朋友。”这里,他对孙犁以爱相称,可见其研究之炽情。

杨振喜研究孙犁可以称之为系统工程。如果说他的《孙犁评传》《孙犁论稿》基本上为这位文学大师雕塑成像,那么他的《孙犁散论》则是对此的深度解读,多篇文章点出了孙犁文学思想的精髓,从“晚年孙犁的魅力”说起,进一步阐述了“孙犁的大众文学观”“孙犁的文学贡献”“孙犁的现实主义文学论”,甚至他没有忽略孙犁的读书记、随笔、书衣文和杂文。他对此是这样理解的:“孙犁的作品,首先在于思想,在于识见与文采,而这些,都散见于他那不同凡响的言论之中。”

文学是一种发现,作家们在发现着,评论家们在发现着他们的发现。与文论而言,学识不同、立场不同、审美不同,虽说是公说婆说婆,但是你总得说得有依据、有逻辑,有情有感,这才能让人口服心服,对此,《孙犁散论》做得是够好了。

孙犁研究,只是杨振喜先生一个方面、一种方向,除此之外他还出版了《当代文学流变》《文学的认知与阐释》《批评的空间》《文论末编集》等文论著作。他的笔墨,几乎覆盖了当代有影响的作家和作品,他更特别关注河北作家,在《文论末编集》中,他写田间早期诗歌创作,也写浪波近期诗歌的美学追求。他论贾大山、宋聚丰、关汝松的小说,更青睐冰凝、徐光耀的大作。在他的其他文集里,对河北更多的作家都曾进行过审慎的艺术扫描。他为什么这么做,自然有他的各样理由,但肯定有一点是确定的,作为河北文坛一位长辈,他对河北文学这块热土爱得深沉。

文学评论,肯定是要影响文学创作的。作家们在迷茫的时候,常常可以在与时代、与生活贴近的文评里觅到前方的光亮。杨振喜的文风、文艺思想,无疑影响了河北文艺评论界研究和创作。

华夏民族的精神文化宝库富之又富,说具体些,那不就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千年诗文吗?其中也少不得以《文心雕龙》《二十四诗品》为首领的文艺理论。文艺理论本来就与文学创作相辅相成、须臾不分,但近些年来,在这个界面却出现了一个怪现象:作品创作者太过于自我,一面重创作、轻理论,一面又希望其作品有理论去评说。文艺评论家又似乎太不自我,他们常常被认为是作嫁衣裳。就是在这样的情境下,杨振喜固守着文艺评论之领地,咬定青山不放松,任尔东西南北风。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自我的,坚持不懈地思考着,枕戈饮胆,志坚行苦做到了现在,这就是他的一种生命姿态。他对别人理解了那么多,别人却缺少了对他的解读。他对自己的文稿谈之甚少,谈及必说孙犁。真正的大家都是这样的,著述之多,却只认同自己有一二,比方杨振喜眼中的孙犁,当有人去看望他时,孙犁总要拿出两本书相送,一本是《风云初记》,一本是《芸斋小说》,并附之以嘱:“我的生活,全在这两本书里。”

显然,在杨振喜出版的多部著作里,他更青睐对孙犁的研究成果,包括他近日出版的《孙犁散论》。

杨先生是爱书之人,他家中书橱林立,藏书应有尽有。作家们在创作着,评论家们在关注着,相对于作家创作而言,文艺理论家则一定要比前者读书更多,学海无涯苦作舟,腹有诗书气自华。一边读书,一边撰文著述,这几乎就是杨振喜生活的全部。

青灯黄卷,是文人清贫之一隅,青灯黄卷,又是文人精神富有之世界。论说之外,杨先生也出版有散文《柝下集》《青灯伴我》,其散文写得厚重,多带哲思色彩,他把自己的散文叫作读书文章。杨振喜的人生只在书文里出彩。